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早期探索

张 晓 芳

(南方科技大学 人文科学中心,深圳 518055)

摘　要: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必要阶段,建国以后的头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进行了早期探索,在取得重大成果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通过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去实现民族复兴,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工业化;农业;客观规律; 民族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K 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9)04-0011-10

一

一般而论,工业化是指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至取代农业成为经济发展主导的过程,亦即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是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物,它的发生,促进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证实,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必要阶段,不断提升工业化的水平,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之前,这个时期的工业化是被动的也是极为不充分的。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打破了清朝的闭关自守,中国陷入了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况,“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①。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自 19 世纪 60 年代到 90 年代晚发起进行了一场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基本方针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重要举措是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轮船、铁路、电报、采矿、纺织等各种新式民用工业和创办新式学校,选送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等等,这场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但是由于固守封建制度和文化,中国没有走上富强之路。1894 年开始的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第二个时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自觉实施的国家发展战略。全国解放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要求全党做好准备,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他后来又谈到:“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如果工业不发展,已经独立了的国家甚至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②因此,与前一个时期的工业化相比较,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在制度设计、主体构成、目的要求、规模范围和指导思想上有着重大的区别,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工业化过程。

收稿日期:2019-05-30

作者简介:张晓芳,女,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副教授。

①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4 页。

② 《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51—152 页。

同样是工业化,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必然会有自己的不同特点。建国以后的头十年,是中国工业化的准备和起步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特点和规律进行了早期探索。

二

由于长期的战争,解放前中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建国以后头三年的主要工作是治疗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底,中国共产党遵循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经过艰苦奋斗,使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随着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和朝鲜停战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协议,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具备了。

但是,旧中国留下的经济家底十分薄弱,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在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要开局,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国内将有限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二是如何引进和利用国外的资源、资金和技术力量。

关于第一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好社会经济中的两大矛盾:一是土改以后农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二是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扩大自由生产和贸易的要求难以满足国家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需要。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了日程上来。②

为此,毛泽东在 1952 年 9 月提出了“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经过反复酝酿,1953 年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③。

这条总路线的内容简称为“一化三改造”,其战略意义被形容为“一体两翼”。“一体”即工业化,它是总路线的主体,是强国的必由之路,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中国最要紧的事情,“两翼”即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归类为改造个体经济和改造私人资本主义,它们是为中国工业化创造制度条件、开辟发展道路的必要之举,体现了变革生产关系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一体”和“两翼”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开创上,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要求的自觉认识和遵循。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民主革命的经验,在工业化上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又争取可能和必要的国际援助。在当时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只有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国际援助,除了资金、项目、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外,苏联的援助还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苏联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历史的借鉴意义,二是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于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现实的示范意义。

根据苏联快速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党中央当时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

---

① 《毛泽东文集》第 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9 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17 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4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602—603 页。

间,希望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奋斗,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 1951 年开始,我国就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年起在实施中继续讨论修改,1954 年 9 月形成草案,1955 年 3 月经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讨论同意,7 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这个草案。

“一五”计划的实施,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为了适应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需要,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了步伐,1955 年夏季以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群众运动的猛烈发展,对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加快了,到 1956 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生产关系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生这么深刻的变化,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工作过粗过急的问题,但是总体是平稳的,生产力的发展得到了促进,1956 年与 1955 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长 6. 4%,工业总产值增长 28. 8%。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逐步过渡的方式,以新的实践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加快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成为党中央重点考虑的问题。1956 年 2 月苏共召开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报告触及了当时苏联共产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国共产党对这一事件做了冷静的分析和深入的思考,1956 年 3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①

毛泽东的这个重要看法表明,中国共产党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但是肯定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有助于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思想,走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对走自己发展道路这个问题的思考,在苏共二十大之前就开始了,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一步促进了我们对问题的研究。1955 年底至 1956 年春,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分别听取了中央和国务院三十多个部委的工作汇报。1956 年 4 月 4 日,毛泽东在中央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会议上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②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提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具有全局性长远性指导意义的看法,基本方针是:“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即十大关系,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苏联在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一些问题上的弊端,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

①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45 页。

②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10 页。

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①

《论十大关系》提出和分析了十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大问题,其中主要讲经济问题,着重讲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要发展好重工业,就必须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要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要使军队装备先进,就要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就要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这五条讲经济问题的关系,实际上提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基本要求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基本问题是农村、农民、农业,基本方法是综合平衡、统筹兼顾。因此,这条道路不仅仅是工业的发展问题,还必须是农业的发展、国防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等方面的问题,简言之,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现代化问题。毛泽东后来回顾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②

这条工业化的“中国的路线”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二是两条腿走路。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中国工业化的总方针,它包括两个问题:一是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在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问题;二是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排序问题。《论十大关系》中,针对苏联为快速完成工业化,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导致国民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的问题,毛泽东在第一条就谈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③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④。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调查研究工业积累和农业积累的适当比例和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在计划安排中的顺序问题,1959 年 9 月,在一次关于“三五”计划安排的谈话中,毛泽东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苏联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我们一定会比苏联搞得快搞得好。”⑤毛泽东的这个考虑在党内的讨论中得到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的赞同,并首先公开于 1960 年 3 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中,两年半以后,在 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最终确立。

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基本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就是两条腿走路,但是两条腿走路又不仅限于农轻重的关系,而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十大关系“就是两条腿走路”⑥,这就是说,两条腿走路体现的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 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418—419 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4 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40—241 页。
⑤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第 557 页。
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4 卷,第 69 页。

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看,“两条腿走路”就是讲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实现的,中国工业化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发展,也只有在对矛盾双方的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中才能最大可能得到实现。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后又在不断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对这一方针做了深入的论证和丰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上对为什么以及如何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做了深入的分析,实际上讲清楚了“两条路走路”的政治动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是在人民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而是非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还存在着敌我矛盾,但是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吸取苏联教训的重要方面,也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证。他说:“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②

1956 年 9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代表大会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极为重大的意义。首先,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其次,正确制定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提出了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最后,正确地提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的任务,为了承担起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八大提出要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并根据苏联的经验教训,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要求按照“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办事。

1957 年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完成,1957 年工农业总产值 1241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67.8%。其中,农业总产值 537 亿元,增长 2.8%,所占比重由 1952 年的 56.9% 下降到 43.3%;工业总产值 704 亿元,增长 128.6%,所占比重由 1952 年的 43.1 上升到 56.7%。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粗钢 535 万吨,增长 296%;煤 1.31 亿吨,增长 98.5%;发电量 193 亿千瓦小时,增长 164%;粮食 19504.5 万吨,增长 19%;棉花 163.9 万吨,增长 26%;油料 419.7 万吨,增长 0.07%。交通、卫生、教育等其他事业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953 年—1957 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为 18%,高于同期苏联(11.6%)、美国(3.6%)、英国(3.8%)、西德(10.1%)、法国(7.9%)和日本(15%)。

五年来,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588.47 亿元,1 万多个建设项目进入施工,限额以上的 921 个,全部建成投产的 428 个,部分建成投产的 109 个,一方面,随着不少旧中国没有能力或能力薄弱的制造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器等等的建立,改变了

①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3 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16 页。

过去工业门类残缺不全的状况;另一方面,随着一批煤矿、电站、油矿等能源基地和原料基地的新建、扩建,大幅度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①,“一五”计划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任务基本完成。

三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在矛盾中进行不可能一帆风顺一样,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也是一样,八大以后,在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政治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二是经济上如何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和速度问题。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这就使得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处理这两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使得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出现了反复和曲折,八大开始的中国工业化发展新的进程被打断。

阶级斗争问题的突显与两件事件的发生有紧密关系,一是 1956 年下半年由国际上波匈事件和国内一些群众闹事而形成的“多事之秋”,二是 1957 年上半年由全党整风转化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最初是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面来考虑问题,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他对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失误,1957 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1958 年 5 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这是对八大关于主要矛盾论断的重大修改,其结果,不仅偏离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既定方向,而且也为后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和速度问题在党的八大之前就有过讨论,1955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曾经开展过批判,毛泽东在 1955 年底提出要以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动力量,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求凡是办得到和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1957 年底,受社会主义阵营内兴起的赶超资本主义浪潮的影响,毛泽东在苏联提出 15 年赶上和超过美国后,提出中国 15 年在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最重要问题,是总路线的灵魂,在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会议还通过了 15 年赶超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 5 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要求“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全面开展起来。

农业上,强调“以粮为纲”,从最初要求 5 年、3 年到最后要求一至两年达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错误观点的引导下,农业生产上盲目推行深耕密植等所谓先进经验,造假风、浮夸风、瞎指挥盛行。

工业上,强调“以钢为纲”,从最初要求 7 年、5 年到最后要求 3 年实现 15 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1958 年钢产量比 1957 年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为了在会后余下的 4 个月时间完成这个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任务,全国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一方面,全国 9000 多万人被动员上山,砍树伐木,挖煤找矿,建起了几百万座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

---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 479、480、481 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3 卷,第 223 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8 页。

钢;另一方面,已有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要求大搞群众运动,打破各种规章制度,高强度的生产。

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到 1958 年底,四个月生产钢 1108 万吨,合格的只有 800 万吨。由于搞“全民大办”,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仅湖北省一个区域,成林面积减少 58.50%,森林蓄积量下降 33.70%,其森林面积 1958 年比前一年减少了 32.43%①。

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也是“大跃进”的产物,最初是在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中,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小社并大社引起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为这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有效组织形式,给予肯定,设想在农村将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设想得到各地的响应。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提出 1070 万吨钢产量指标的同时,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要求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将公社现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认为“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议后全国农村出现人民公社化高潮,一个多月后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农户 99%以上进入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在体制上实行政社合一,分配上是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基本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在公社范围内搞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一些财产可以无代价上调。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现有发展水平的要求,一经刮起,给农村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

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初衷是好的,就是想快一点将中国经济搞上去,尽快摘掉“一穷二白”的帽子,加快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是忽略了尊重客观规律,包括既要尊重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也要尊重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这段时期的工作失误中,两个方面的忽略都是存在的。比较而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在于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而“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在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重在违背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规律。

以大炼钢铁为例,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炼钢技术,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广泛采用的是平炉技术,50 年代兴起的是顶吹氧气转炉炼钢技术。1958 年 10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土铁炼好钢》,称“土铁炼钢,是目前钢铁战线上一个新的课题,一个技术难关,但是,这个关非过不可。不仅是我国当前钢铁生产中的迫切课题,而且,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还具有重大的国际科学技术意义。……要打破‘洋’办法的束缚,创造一套适合于中国原料情况的炼钢法”②。文中所指的“土铁炼钢”法,主要包括土转炉炼钢、土法坩埚炼钢、土法低温炼钢和土缸炉炼铁几种基本方法。

平炉炼钢技术是 1865 年法国工程师马丁利用西门子发明的火焰炉发展出炼钢工艺,主要优点是:可以使用大量价廉的废钢为炉料,冶炼过程比较易于操作和控制,产品质量优良。但是,平炉炼钢的技术壁垒比较明显,一是耗能高,二是周期长,生产一吨钢大约要消耗 100 万 kcal 的热量。中国的平炉炼钢技术历史并不短,1890 年就有了第一座炼钢平炉。

1948 年 4 月 R. Durrer 教授在瑞士 Gerlarfingen 进行纯氧顶吹实验获得成功,为纯氧顶吹炼钢揭开序幕,1952 年首先由奥地利林、多纳维茨两家钢厂采用,LD 法也因此得名。LD 炼钢技术的发明,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很快被全世界多个国家所采用。自 1957 年以后,日本、美国、西德等国也陆续引进了 LD 炼钢技术,到 1970 年,已有 30 多个国家 150 多个钢厂采用了 LD 转炉技术。

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炼钢产业技术转型的关

---

①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大跃进”运动(湖北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87 页。

② 《用土铁炼好钢》,《人民日报》1958 年 10 月 12 日。

键时期,中国为了赶超英美国家,实现炼钢产业的跨越前进,却选择了一个在当时科技含量最低的技术路线——“土法炼钢”。这一选项固然与当时我们要在短时期大量投资建设新的钢铁厂缺乏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特别是技术力量有关,是不得已的选项,也与我们当时对发展生产力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有关:即认为可以通过搞群众运动,投入足够充分的劳动力,就可以替代技术进步的力量,使生产力大幅度的持续增长,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将农耕文明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经验简单移植到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忽略了工业革命以后,科技逐渐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历史趋势。

几乎在与中国“大炼钢铁”同一时期,邻国日本也正在进行炼钢技术的转型。与中国采用“土法炼钢”和其他旧式炼钢方法不同,1956 年日本开始大幅度提高转炉炼钢比例,进入 70 年代后,LD 技术已成为日本的主流炼钢技术。1971 年,日本氧气顶吹转炉钢的比例为 80%。1952—1975 年日本钢铁产业投资的年均增速为 17.4%,而同一时期,钢铁产量占全球比重较大的国家,如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等的钢铁产量增速仅分别为 11.7%、7.3%、8.7%、6.0%、8.2%,可见,新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日本钢铁产业的生产率。

LD 技术的采用,使得钢铁业产值在日本全产业中占比由 1960 年 4.8%提高到 1970 年的 7%,粗钢产量 9300 万吨,钢产能增至 1.14 亿吨,出口明显增加,1973 年粗钢产量达到顶峰,劳动生产率创下 497.2 吨钢/人/年。钢产量和出口量以及劳动生产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1956-1960 中日钢铁产业情况①

	从业人数(万)		粗钢产量(万吨)	
	1956 年	1960 年	1956 年	1960 年
中国	448	6000	447	1866
日本	21.2	30.5	940	2213

对比大跃进前后中日钢铁产业的发展情况,中国在同一时期钢铁产业中投入的劳动力与劳动时间远远大于日本,但是日本在经济产出上远胜于中国,其重要原因在于炼钢技术的选择差异。日本在钢铁产业的合理化计划中逐步进行了技术结构调整,完成了技术的转型升级,利用国际领先技术为自身钢铁产业的发展赢得了先发优势。

LD 炼钢技术的发明,对中国的钢铁工业发展来讲是一次重要“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然而,技术路线的错误选择,使中国错过了真正有可能实现钢铁“大跃进”的历史机遇,其结果,是资源的浪费和钢铁工业的衰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方法,大高炉和土高炉的吨铁成本分别为 100 元和 350 元,这样换算下来,仅 1958 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土法炼铁、炼钢至少造成了 50 亿元以上的直接亏损;“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向钢铁企业总投资 38 亿元,吨钢投资 950 元,而在“大跃进”期间,这两项数据分别为 115 亿元、3433 元,但是结果却是钢铁工业的大幅衰退。依行业内专家预测,按照一般发展速度,我国 1964 年的钢铁产量应在 2000 万吨以上,然而 1964 年全国钢铁总量才达到 964 万吨,一批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如鞍钢等陷入发展困境,设备水平低,规章制度落后,产品品质低等问题显现出来,若干规划新建、改建与扩建的钢铁工业工程被推迟甚至取消,为接下来的钢铁产业能力补充和连续造成了阻滞。②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的严重后果在 1958 年底开始显露出来,在觉察失误以后,党中央做了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经过从局部到全面的调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发展了自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延续和发展了党在阶

①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83》。中国在 1956-1960 年期间的钢铁产业从业人数由于各方数据统计口径不尽一致,且来源不甚详实,该数据系作者根据文献整理分析估计判断所得,仅做参考。

② 茅坚鑫:《“大跃进”运动中的工业“技术革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4 期。

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四年之后,“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的内乱发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1964 年,在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之际,周恩来在 12 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分两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 1966 年即将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这个战略构想的实施被严重耽搁了。

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导致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当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邓小平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 1978 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大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伟大梦想,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六十年前,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正是这个壮丽史诗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在这个历史时期所积累的经验和所得到的教训,都是后来推进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宝贵财富,1960 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写道:“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我们过去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②六十年来,这些历史经验一直在启迪人们:

第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一般要求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文化、中国老百姓的意愿结合起来,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独立自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确保经济工作的中心地位,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既要避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要坚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三,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为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四,必须坚持先进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始终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动力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改造传统工业,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大量消耗资源、依靠廉价劳动力、依靠大量投资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创新上来。

第五,必须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

---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52 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49—1967)》第 4 卷,第 420 页。

观规律有机结合起来,既要有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更要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把握好事物发展的“度”,警惕右,更要防止“左”。

第六, 必须加强宏观调控,注意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坚持“两条腿走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又作出了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历史进程的形成和战略规划的制定,都与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早期探索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前,中国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推动新常态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全面深入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 13 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 30 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①认真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早期探索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在今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掌握引领新常态的主动权,不无裨益。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to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Zhang Xiaofang

(*Center for Humanities,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and necessary stage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in the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to socialist industrialization in practice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significant results, we have accumulated both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profound lessons. To summarize thes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promote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ze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rough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agriculture, objective law, national rejuvena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01 页。